

时局与战略：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起义研究

孙铭泽 董粉和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 乾嘉时期川陕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 给清王朝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平叛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 清王朝暴露出在吏治、军队、民心、财政等多方面的问题, 清剿屡战屡败。最终, 在复杂的局势中, 清王朝制定了有效的战略方针, 完成了对白莲教的清剿和对王朝统治的维护。本文以清代苏州状元石韞玉在嘉庆三年 (1798) 至嘉庆九年 (1804) 的为官经历为研究中心, 通过梳理石韞玉从征白莲教的始末, 探究白莲教起义发展壮大、清军剿匪不力、清王朝战略摇摆不定的原因。同时, 通过对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起义经历的分析, 分析清王朝平叛战略的合理性, 以及这一战略战术是如何被沿用到几十年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当中的。

关键词: 石韞玉; 白莲教起义; 征邪教疏; 坚壁清野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3

石韞玉 (1756-1837),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中举, 五十五年 (1790) 考中进士, 在殿试中被特拔置第一甲一名, 授翰林院修撰。至嘉庆十二年 (1807) 告病归田, 石韞玉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四川重庆府知府兼护川东道、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嘉庆十二年 (1807), 部议革职。仁宗念其军功, 赏给翰林院编修、国史馆行走。旋以足疾请辞归田。卒于清宣宗道光十七年 (1837), 享年八十二岁。

一、川陕楚白莲教起义

清乾嘉时期, 在移民聚集的川陕楚毗邻地带爆发了长达数年的白莲教起义, “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徒众, 潜蓄势力, 为反抗清廷之运动, 如白莲、红阳等教为数无虑十余。而白莲教会为尤盛, 乾、嘉之际一再发难, 风动五省, 竭海内之兵力, 逾十年而后定。”^[1]给清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白莲教在川陕楚地区的流行是有原因的。首先, 清中期以后, 川楚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清代, 是“湖广填四川”运动的高潮时期。根据学者曹树基建立的从顺治十年 (1653) 至 1953 年四川人口的变动统计表, 四川人口在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大约有 231.6 万口, 在嘉庆十七年 (1812) 有 2071 万口。^[2]在一个世纪中, 地区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人口密度随之增长, 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 清廷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 中央威慑力不足。另外, 清廷吏治的腐败也造成了民心的流失。从地方到中央, 官吏贪腐之事比比皆是。百姓最直观能感受到的, 就是州县中的吏治情况。官员之间, 节礼、生日礼、升迁调补私相勾兑之费, 名目众多, 都要从州县百姓身上搜刮而来。“钱粮漕米, 前数年尚不过加倍, 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 无不明知故纵, 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3]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 朝廷却无所作为。

四川的白莲教起义, 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案列。据史料记载, 四川官场的吏治腐败问题十分严重, 官吏对民众敲诈勒索的手段极其恶劣。尤其是以查拿邪教为口实, 诬良为盗、颠倒黑白, 乘机敲诈勒索、大肆搜刮。^[4]如达州知州戴如煌, 私设衙役五千余名, 并将这些衙役分发各地查拿白莲教, 贪赃枉法、敛怨启衅以致民怨沸腾。当地白莲教教首徐天德、王学礼等, 都曾被他拘押, 刑讯逼供, 直到勒索白银数千两, 才得保释。

白莲教的教义和宣传迎合了移民们想要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习其教者, 有患相救, 有难相死, 不持一钱, 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未也。”^[5]白莲教的传教手段也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白莲教托弥勒佛降世, 既持斋咒, 兼用符篆, 或天行疾疫, 治以符篆, 偶尔痊可, 信从渐多。”^[6]普通民众, 既在精神世界里需要信仰的支撑, 也在现实世界里需要求生存的道路。白莲教的教义宣传很顺利地底层民众间铺陈开来。

作者简介: 孙铭泽(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董粉和(1964—), 男, 学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科技史;

二、石韞玉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石韞玉熟读兵书,对军事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征邪教疏》中,对兵法的理解和运用十分熟练。嘉庆三年(1798),朝廷大考詹翰,题目为“征邪教疏”,即是为了广纳贤言,集思广益,更大范围地讨论白莲教的平叛一事。这次大考中,石韞玉所写文章如下:

臣闻陶唐御宇,征及有苗,蚩后兴师,战于甘野。自古帝王之治,不废师旅之谋者,盖以天生五材,金有从革之用;国重八政,兵佐司寇之刑。邦禁所垂,古今一揆。

近者六寓阜宁,四民安谧,生齿既庶,良莠不齐。楚、豫之间,遂有奸匪,倡为邪教,煽惑群愚。我皇上命将出师,屡加歼戮。而一二余孽,尚复偷生者,良以奸徒生长草泽,凭险负隅,出没无常,鸟聚兽散。我兵之攻守有常,而彼贼之窜逃无定始也。官兵在楚则贼窜于豫,官兵至豫则贼窜于秦,官兵至秦则贼又窜于蜀。近日,黔、楚二省苗逆荡平,官兵可以并力于蜀,而贼又有窜还豫、楚之势。所以剿之不能尽,追之而不能穷者,职此故也。臣闻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旷日持久,昔贤所戒。况今道里辽远,兵勇众多。刍米金钱,皆资转运。兵有拙速,不闻迟巧。诚宜设布方略,立加扑灭者也。方今贼匪聚秦、蜀之间,一闻官兵之至,则穷窜入山。稍有间隙,窥伺乡村,肆其焚掠。若就其所至而为之防堵,贼众东奔西逸,我兵赴之,是贼逸而兵劳也。所宜探其出没之踪,察其往来之巡。彼遏其前,此截其后。四路期约并进,务为一鼓而擒之计。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战”者,此也。再者,贼氛煽动,已经两载,乌合之众,岂无胁从?解散其党,亦非难事。诸将诚能割切著明,诱以自新之路,谕其从逆之非。豚鱼可孚,何况人类?若党羽既散,则渠魁自得。兵法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也。又,今贼目已有数人,奸徒争利,易生嫌隙。诸将若能相其机会,加之诱掖,诸贼必有起而相噬者,此亦以贼攻贼之计。因其相噬,我兵乘之,兵法乘瑕,此之谓也。至于山林相阻,宜用火攻,原野相遭,利于炮击。广设侦候,以求贼踪。慎选向导,以穷贼藪。贼若入山,则设伏以邀之。贼若薄城,则清野以待之。慎赏以劝勤,严罚以惩惰。诸将当能仰遵睿算,和衷集事,迅奏肤功,捷书之至,必在旦夕矣。臣谨疏。^[7]

石韞玉的《征邪教疏》大概强调说明了以下几点信息:

首先,白莲教是被朝廷官方定义为邪教的,且信徒众多,具有一定的团结力和煽动性。

针对白莲教的平叛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是剿灭不净,如同野草春风,吹之又生。

白莲教在与清兵的对抗中,发展出了避其锋芒的战略。凭借当地有利地形,保存力量,在川陕楚多地实行战略转移。清军很难一击即中,也很难将其一网打尽。往往贼走并至,行军迟缓。造成朝廷财政的重大损耗。

白莲教匪徒并非良善之辈,“窥伺乡村,肆其焚掠”,对百姓同样残暴。

石韞玉针对白莲教叛乱的现状,谏言有五:

重视军情的探查,掌握敌踪,遏其前,截其后,做好排兵布阵,争取一网打尽。

针对白莲教煽动人心的特质,采取劝导和教化的方式,使人改过自新,从普通信众入手,从基层瓦解党羽。

从白莲教上层组织入手,挑拨离间,促使其内斗,引起内讧。清兵乘机剿灭,坐收渔翁之利。

因地制宜,灵活选择武器和战术,及时掌握敌人动向,“贼若入山,则设伏以邀之。贼若薄城,则清野以待之。”

严格管理军队,做到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上下一心。

石韞玉的军事建议,从军队建设、武器运用到兵法实践、实际战略一应俱全。其中,石韞玉的战略主张之一“坚壁清野”尤为微妙。这一条,可谓是抗击白莲教的基础战略方针。恰是因为石韞玉的谏言切中了朝廷之忧虑,石韞玉才会在翰詹大考中被定为大考一等,又授重庆知府,参与进白莲教平叛一事中。同时参与大考、写《征邪教疏》的洪亮吉被定为三等。石与洪二人文章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朝廷对二人文章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当时清廷对剿白莲教匪的态度。

洪亮吉在文章中,表现出了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3]但此时,朝廷需要的不是对百姓的具体关切和探讨民生疾苦,而是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平定叛乱的战略方针。石韞玉文章,则是从清剿白莲教、瓦解白莲教的方向出发,给出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切中了朝廷的忧虑。

对于清剿白莲教,朝廷的决策是有变化的。起初,朝廷不打算采取坚壁清野、修筑堡垒的策略。嘉庆二年(1797),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上奏称,官军在川陕诸省清剿白莲教军时发现,村庄居民无城隘保护,容易成为白莲教军劫掠的目标。村庄的粮草物资,甚至人口,都会成为白莲教补充实力的来源。“是以自用兵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8]面对复杂胶着的平叛情况,二人提议,“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飭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8]同时,二人还列举了实际案例,证明守堡之法的可行性。“近日襄阳绅士梁有穀等筑堡团守,贼屡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御贼安民,必可刻期扑灭。”^[8]明亮、德楞泰二人的建议是修筑土堡,采取守堡之法,平贼安民。

坚壁清野之议就是指堡寨法。但是朝廷对于守堡之法并不满意。此二人奏折递上后,“虽奉旨以‘筑堡烦民,不如专禽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8]朝廷认为,修筑堡寨之法劳民伤财,不如集中力量抓匪首,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叛乱。“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3]但是,坚壁清野的提议,是从明亮、德楞泰的上奏开始的。

前线作战人员提出坚壁清野、修筑堡寨的建议是有来由的。有白莲教匪患之地地形复杂,地势险要,贼匪流窜。“川、陕、楚三省,犬牙相错,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

处滋扰。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未来，兵到而贼已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9]清军在这样的战斗中显得兵力不足，而战斗力屡屡减损。仅仅凭围追堵截，追贼擒贼，往往被贼匪逃窜去。

西南战况之艰，使得北京的讨论一直在持续。随着前线战况的变化，朝廷的战略方针逐渐偏向于坚壁清野、屯田守堡。嘉庆五年（1800），廷试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湖南溆浦严如煜对几万言，仁宗亲擢第一。其折略曰：“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10]严如煜重新强调了筑堡屯田之法的实用性，并强调了训练乡勇的意义。“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11]

其实，训练乡勇这一想法，石韫玉早在守卫重庆之时便已然具体实践过。石韫玉保卫重庆之时，在城中重编保甲，设团练之法。“于是申明保甲之法，设十家牌，每夜输一家守夜，城中禁夜行。”^[12]石韫玉曾上《办理团练折》，详细地说明了如何招练乡勇，以及如何运用乡勇力量。他指出，乡勇能够很好地协助清军对抗白莲教，“督率团勇寨民，同心协力，共扫余氛。”^[13]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平叛白莲教过程中得到实践的团练之法还为后来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参考。曾国藩幕僚徐子苓就曾在《庐州再陷记》中言道：“夫团练良法也，嘉庆初，楚中白莲教之变，尝议行之。其大指官与民相协，民与兵相卫，故自安恤难民之说行，而后民之从贼者始少；自坚壁清野之说行，而后贼之成擒也益易。”^[14]团练乡勇，辅助官军和坚壁清野的战略，几十年后仍被清军使用。

在与白莲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后，朝廷最终采取了“坚壁清野、守堡屯田”这一策略，并在前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纵观全局，清廷的政策之所以在“坚壁清野、守堡屯田”和“速战速决，擒拿贼首”之间摇摆，都是因为白莲教难以清剿，朝廷财政消耗巨大，所取得的成效时好时坏。故而在长达数年的白莲教叛乱期间，清廷的军事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

此外，石韫玉还了解火器的使用方法，支持军队使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石韫玉十分重视火炮的应用和铸造，“将来攻城、攻寨，其势必出于此。”^[15]他曾在致湖南巡抚姜晟的《与姜中丞第二书》中，就对清军火炮的应用和铸造给出了两千余言的建议，还作《铸炮说》一则附呈。

石韫玉对兵法与实际结合的应用也颇有见解。他在《与姜中丞书》中，就曾详结合讨伐苗民叛乱的方略，指出地理设施建设对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或改建旧城，或新设石桥，治疾于腠理，防患于未然。

石韫玉还具有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他建议姜晟提前在门户险要之地排兵布阵。“多分汛兵，移一将备领之，以为桃源、武陵一路门户之固。此在今日似无关轻重，而绸缪未雨，必有得力之时。”^[16]

石韫玉是坚壁清野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他作《守寨方略》十二则，檄行川东北。极大地打击了白莲教的势力。“坚壁清野，中田无资盗之粮；筑堡防江，下民有同仇之义。”^[17]

石韫玉的战略主张和后勤保障都极大地支持和影响了白莲教平叛的进程。清人陶澍在文集中记载，“公谓勒公曰：‘今官兵仅经略、参赞及公三路耳，而贼至数十股。若专剿一股，余无兵掩捕，势且益炽。为今计，莫若分兵，有一股贼即有一路官兵迎捕，使贼无暇劫掠。贼不得食，当自溃。’勒公曰善，即属草一疏陈之。壬戌三月，始定分兵策，兼用坚壁清野法。”^[18]石韫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为勒保定分兵策，兼用坚壁清野法，为清廷打击白莲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此贼渐解，贼首次第就擒。是冬，即勘定大局，至癸亥秋，而三省廓清矣。”^[19]可以说，石韫玉的战略主张加速和推进了白莲教最后的覆亡。

三、石韫玉的川东军功

在经略大臣兼西安将军勒保幕中，石韫玉深受赏识，受命主理川东军务。在此期间，他保卫重庆、处理军队后勤事务及善后工作。

嘉庆五年（1800）春，白莲教军进犯重庆。石韫玉率部依据嘉陵江等有利地形，防守重庆，终使白莲教军败溃退走。《守渝记》载：“嘉庆己未，余出守重庆。时白莲教妖人作乱，余奉经略大臣檄，总理川东军务……其渝城有兵二千，余尽令出城，创二营于浮图关，扼贼北来之路。”^[20]石韫玉调军队，又调乡勇，将城中居民编保甲，复行团练之法，共同拒守重庆，又与总兵许文谟协作防守嘉陵江。“历十旬而至夏，官兵大集，冉天元被擒，贼始退回川北。”^[21]嘉庆五年，因防守重庆有功，加道员衔。

在重庆任知府期间，因为战乱，许多百姓避难逃家到重庆。重庆产生了疫情。石韫玉从宋人的医方中取得一方，制成药丸，发放给百姓，预防了城内的大疫。

此外，石韫玉还与县令余钰共同商讨构筑长寿新城。因白莲教乱以及战争的损毁，长寿旧城满目疮痍。“三年冬，贼氛入境，公私靡舍，一时俱烬。”^[22]石韫玉出守重庆后，考察地形，辨识地貌，请来余钰，以此事相嘱。

“四年十二月，武进余君钰来宰是邦，谒府之日，余首以此事相属。”^[23]长寿新城于嘉庆五年七月始建，嘉庆七年三月完工。

川陕楚白莲教势力基本肃清后，军队凯旋，有离乱妇女数千人。有人提议将妇女分给兵丁，石韫玉坚决反对，全部将她们问清籍贯，遣返归家。“大兵凯旋，有难妇数千无所归。众议欲分给兵丁。公力持不可，遍询原籍，有父母兄弟及夫若子者，檄各州县尽来省相认，识以归之。咸感泣膜拜而去。”^[24]石韫玉还关心离乱百姓的亲人团聚之事，用心良苦。

石韞玉在川，尽心兵事，多有劳累。在云阳道中，石韞玉所乘舟触礁石而败，几乎溺亡，幸被他舟所救；在川北白沙河坠马受伤，但因牵挂军务，仍坚持随营。他还因连年从军山谷，受山中潮湿之气的侵扰，患上十分严重的足疾。

嘉庆九年（1804），四川大计群吏，石韞玉名列一等。^[12]

四、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从征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石韞玉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奏折、谏言、书信。这其中，诗词是最能够体现其本人的心境变化，抒发本人所思所想的。前往四川途中以及驻守蜀地期间，石韞玉写下很多诗文，从诗文中可看出其态度变化。

嘉庆三年（1798），石韞玉奉旨补授四川知府。起初，石韞玉对自己在前线建功是有期待的。他踌躇满志，设想自己勒石簪缨的戎马生涯：“书生岂有勒铭才，漫请长缨蜀道来。杨柳绿依戎帐近，樱桃红傍戍楼开。回溪转石喧如雨，飞骑穿林疾若雷。但愿及时洗兵马，敢求颜色上云台。”^[7]

外放的任命下来后，京中许多好友为石韞玉践行，纷纷写诗送别。此时，石韞玉对自己的前途是期待的，对于平叛教匪一事是颇有信心的。嘉庆四年春，石韞玉将渡黄河，作《将渡黄河寄简都门亲友》诗云：“行尽蒲东路百盘，一封书寄报平安。清时不觉秦关险，世论多言蜀道难。节过上元风渐软，地经太华雪初残。前途日与青天近，十万峰峦足下看。”^[7]一行人意气风发，期待建功立业。

但很快，他就看到了白莲教叛乱中的另一面。因为官场腐败，州县官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民生疾苦。同时，军队的腐败和残暴也造成了许多不幸的事件。在石韞玉赴蜀地上任期间，他就亲眼目睹了夹在白莲教和官府之间挣扎求生的百姓之艰难。石韞玉路过七盘岭时，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了《七盘岭记事》：

“夜宿宁羌州，朝登七盘岭。峻板崎岖高入云，过关卅里无人影。昨宵驿吏向我言，官兵半千关屯。如何今日驱车去，匹马只轮无觅处。鬍头童子草间出，戟手指天向余说：连日关头曾列营，旌旗蔽日刀枪鸣。朝来忽闻有贼信，顷刻仓皇拔营遁。我闻国家设兵以卫民，如何贼犹未至兵先奔？道旁一叟向余泣，但怨官兵不怨贼。官兵避贼如避雷，贼去百里兵始来。贼来焚掠有余烬，官兵所过扫地净。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豈，中田群行麦苗秀。村居十室九无人，绣户文窗摧作薪。承平将吏工谐笑，不习戎韬习文貌。忽闻贼去心肠宽，整顿弓刀迎上官。上官问贼曰小丑，小丑至时大兵走。”^[7]

白莲教不灭，匪患不绝。贼匪之祸尚且未平，官兵不思保卫民众，而是欺压乡里，劫掠百姓的钱财，损坏百姓的房产，破坏百姓庄稼，屠杀牲畜，欺上瞒下，阿谀奉承，百姓困苦无助，求救无门。兵之祸甚于贼。“官兵所过扫地净”颇具讽刺意味。官府的军队，作风之恶劣、搜刮百姓之彻底、吏治之腐败，都让石韞玉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是，他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局面，平定叛乱，打白莲教，并维持朝廷的形象。这是石韞玉要处理的现实，也是清政府要面对的现实。

嘉庆皇帝并非对白莲教平叛事件中的勾兑和黑暗一无所知。据九月癸巳上谕：“闻近日贼匪每至一村庄，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一遇官兵，辄令入伙之人当先抗拒，贼匪随后接应。若当先者被兵剿败，贼匪即乘隙先窜，官兵则随后杀掠报功，节次折内所称杀贼无数者，大抵皆系逼胁平民，而真正教匪早已远扬，所以日久不能成功。”^[13]许多百姓加入白莲教，沦为教匪，未必没有官逼民反，求生所迫的道理。官兵和教匪作战，首当其冲的却是夹在其间的普通百姓。“惟是教匪迫胁良民，及遇官兵，又驱为前行，以膺锋镝，甚至剪发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进退皆死，朕日夜痛之。”^[18]进亦难，退亦难。这是清末川陕楚等地普通百姓所遭受的现实。军队战斗力低下、军纪败坏也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延伸表现。

最终，石韞玉在重庆任上渐渐生出了倦官退隐之意。他的许多诗文里，都表现出了那种对官场仕途的心灰意冷。“何似拂衣归去，江湖放浪余生。杞菊一庐偕隐，鸥波万里同盟。”^[7]石韞玉写诗以明心迹，表示自己欲法古人，拂衣归隐，辞官隐退。

五、石韞玉的为官之道

清剿白莲教后，石韞玉回朝奏对。《勤政殿召对记》记载：

上问：“汝在勒保军营办事，所办何事？”臣奏：“凡勒保答奏及一切文武文移，皆是臣办。又擒获贼匪，亦由臣审问供词。”上问：“贼匪也是你审，究竟他们因何造反？”臣奏：“贼以邪教煽惑愚民，蓄志已久，意在聚众抢掠。”上云：“有人言官逼民反，果否？”臣奏：“皇上圣明鉴察，贼匪蔓延五省，即如四川一省，扰及四十州县，岂有如许州县无一好官之理？实在多是好作乱之人。”上云：“两者都有，贼也可恶，官也有不好的。”……臣奏：“大臣们全仗圣明训示。”上微笑颌之。臣遂叩头辞出。”^[12]

石韞玉在四川为官勤勉，并非高高在上，不问俗事，相反，他处理过大大小小的事务，对百姓的生活情况有很深的了解。他也清楚，官兵对百姓欺压如雷的事实。“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豈，中田群行麦苗秀。”^[7]他亲眼目睹，也亲耳听到了官兵破坏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媚上欺下，瞒报邀功的恶行。他也会义愤填膺，感慨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写出长诗讽刺。但在皇帝面前，石韞玉依然谨守“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做不到对统治者直言谏诤，也做不到站在百姓的角度，陈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现实。

而洪亮吉的为官之道就与石韞玉大为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洪亮吉与石韞玉为同科好友，二人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共同在翰林院供职。洪亮吉会在奏疏中直陈利弊，谏言直谏：“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3]他痛斥众官员不思进取，罔顾生民之计，尸位素餐者众，有意革新者寥。“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

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1]洪亮吉选择为普通百姓说话，认为百姓并没有过多的罪责，朝廷应当更多地约束士大夫和官员群体，推行改革，整顿民生。

但洪亮吉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嘉庆初年，朝政混乱。清高宗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向和珅及其党羽发难，借机整顿朝堂，并下旨广开言路。一时之间，朝臣欢欣。时任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对嘉庆新政提出了数条改进的建议。成亲王永理将洪亮吉的谏议呈送皇帝，皇帝阅后大怒，当即经内閣下发谕旨问罪洪亮吉，将洪亮吉革职，交刑部，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最终戍发伊犁。

洪亮吉的言行，更偏向于一个为民请命的直臣形象。反观石韞玉的为官之道，则代表了大多数官员：圆滑，谨慎，明哲保身。

石韞玉选择了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故他对洪亮吉颇为敬佩。嘉庆十四年，洪亮吉在常州病逝。石韞玉还写下了《更生居士挽辞》，表达了自己对洪亮吉的钦佩和同情：“胪列众公卿，一一寓风刺。剖心志无他，批鳞视如戏。圣明日方中，处士敢横议？”^[7]但石韞玉并没有选择和洪亮吉走在一条路上。

与因进谏获罪，戍发伊犁的洪亮吉不同。石韞玉因在川省有功，嘉庆十年（1805）冬，石韞玉晋为陕西潼关道，掌管潼关税务。

总结

石韞玉所处清乾嘉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朝廷的很多积弊开始凸显出来，导致民变四起。苗民叛乱、白莲教起义几乎同时发生。在石韞玉从征白莲教一事中可以看到：清廷对待叛乱采取的是征讨方略，而不去关心百姓缘何叛乱；朝廷倾向于肃清地方反抗，而非整肃朝政；清朝地方军队军纪败坏，战力低下；清朝的地方官无所作为者甚众，欺压百姓者亦不在少数，很多地方存在官逼民反的现象。

平叛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总结了大量的战略经验，包括坚壁清野、团练乡勇、筑堡守寨，等。这些战略方针在几十年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汉族地主官僚都参考了平定白莲教起义的战略实践经验。

石韞玉是古代封建王朝官员群体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行为符合封建社会官员行为处事的基本逻辑，代表了部分忧心天下，能看到民生疾苦，愿意造福百姓，但不敢直言劝谏，粉饰太平的封建官员。他们面对民生疾苦，并非心无波澜，但是碍于皇权压制、仕途功名、自身利益等，会选择明哲保身，不作为或少作为，甚至欺瞒皇帝。这是官员群体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是封建专制体制对士大夫群体的压迫。历代王朝经历盛衰转折期时通常都存在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 [1] 印鸾章：清鉴纲目[M].长沙：岳麓书社，1987：472
- [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84
- [3] [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571-11391
- [4] 贾大泉，陈世松：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119
- [5] 蒋维明：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233
- [6] [清]严如煜：严如煜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3：1105
- [7] [清]石韞玉：独学庐文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20-836
- [8] [清]魏源：魏源全集[M].岳麓书社，2004：380-394
- [9] 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324
- [1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汇编[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5797
- [11] [清]陶澍：陶澍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7：450
- [12] 睦骏：石韞玉年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79-80
- [13] 赵之恒，牛耕，巴图：大清十朝圣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161-5162

Situation of the Times and Strategy: A Research on Shi Yunyu's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Sunmingze, Dongfenh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China)

Abstract: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n the Sichuan, Shaanxi and Hubei region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Qing Dynasty exposed problem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official governance, military, public sentiment and finance, and suffered repeated defeats in the suppression. Eventually,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the Qing Dynasty formulated an effective strategic guideline, complete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hite Lotus and maintained the rule of the dynas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official experience of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Suzhou, from the third year of Jiaqing (1798) to the ninth year of Jiaqing (1804) as the research center. By sorting out Shi Yunyu's entire experience of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t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Qing army's failure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effectively, and the Qing Dynasty's wavering strategic 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hi Yunyu's experience in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t examin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Qing Dynasty's suppression strategy and how this strategy and tactics were appli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decades later.

Keywords: Shi Yunyu;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strategy for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Jianbiqingye